

第一章 概论

新闻评论是就新近发生的重要事实或人们思想中的突出问题，在新闻媒体上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论说性文体。报纸是新闻评论的主要载体。新闻评论主要有社论、本报（台）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署名评论等几种。社论是最重要的评论，它是代表编辑部就重大问题发表的指导性评论。

第一节 评论的历史沿革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手抄报纸、印刷报纸均最先出现于我国。报纸的新闻评论，起于近代，兴于现代。古代的报纸，无论唐代的邸报、宋代的判报，以及书肆流行的小报，还是明代的京报、清代的“黄皮京报”，都以发表皇室文件、官方信息为主；一些流行小报登的多是传闻；至于农民起义军的揭帖、旗报和牌报，登的多是宣传口号、政策法规。总之，古代的报纸尚无新闻评论。直到近代，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陆续办起报纸。为了在报纸上阐明政见，针砭时

弊，新闻评论应运而生。

1874年1月5日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主编王韬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政论家。此后，在改良派的宣传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论家。除了王韬，还有郑观应、梁启超、谭嗣同等。其中以梁启超鼓吹变法的时评政论影响最大。

辛亥革命时期，报纸宣传活动空前活跃。革命者认识到：“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办报纸，发评论，是最有力的宣传手段。1900年1月，《中国日报》作为革命党人的第二个机关报在香港创刊。1905年11月26日，《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创刊。当时，涌现出许多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太炎、朱执信、陈天华、宋教仁、郑贯公等。其中著名的宣传品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从报刊选录的新闻评论集有《黄帝魂》、《铁券》、《文变》等。

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主要的革命报刊是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和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的《每周评论》。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1922年9月13日，《向导》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这是中共中央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出版的最重要的报纸是《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后来转移到重庆。毛泽东、周恩来

等中共领导人为党报党刊撰写了大量新闻评论，或者说，他们的革命主张，大量是以新闻评论的形式发表的。比如，1943年，《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重要社论。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为新华社写了5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周恩来善于将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新闻宣传密切配合。他重视新闻工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写过数百篇时评政论。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新华日报》写过《论目前战局》、《论时局中的暗流》、《论敌寇的两面政策》、《太平洋上的新危机》、《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七七”四年》、《团结起来打敌人》等重要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25年间，他作为国务院总理，审阅《人民日报》新闻评论750多篇。当然，一些最重要的《人民日报》评论，还是由毛泽东审阅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鲁迅、邹韬奋等革命知识分子也运用报刊开展宣传，评论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鲁迅最有影响的是尤如投枪匕首的文艺性政论——杂文。邹韬奋最有影响的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小言论。

纵观近现代中国报纸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新闻评论在报纸上具有重要地位。重要人物撰写的重要评论，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作用重大。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反省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失败的原因，有个说法：“口权与笔权旁落，政权与军权乃不保，实为最主要亦最基本之因素。”由此可以看出“笔杆子”，尤其是新闻评论的作用之重要。当然，除了“笔杆子”，更重要的是“枪杆子”。到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新闻评论特别是党报新闻评论，在报纸上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不同的是，战争年代以论战型的批判为主，建设时期以指导性的阐述居多。

新闻评论是报纸上两种主要文体中的一种，另一种主要文体是新闻报道。评论发表主观意见，报道叙述客观事实；评论的力量在于讲出道理，报道的力量在于摆出事实；真理是评论的生命，真实是报道的生命。写评论，就是讲道理，要以理服人，有理才有力量。

戈公振曾给报纸下这样的定义：“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即是报纸的两种主要文体。当然，除了这两种，还有文学作品、党政文件、回忆录、摄影、广告、美术等，但主要的文体就是报道和评论。毛泽东一贯重视评论。1958年初，他就如何办好省报问题，给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的刘建勋、韦国清写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他还指示：“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他指出：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

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他这里所说的务虚，主要是指评论。而对写评论，他反对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主张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

第二节 评论的地位

研究新闻评论，首先要研究评论在报纸上的地位，认识到它在报纸上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对于评论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

一、“旗帜论”

“旗帜论”认为：评论是报纸的旗帜，它决定着报纸的政治面貌。的确，评论是一种政治性和指导性很强的文章。我国的报纸，特别是机关报，要习惯于运用评论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政见。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政论家邓拓 1954 年在《怎样改进报纸工作》一文中指出：“报纸的评论特别是社论决定着报纸的政治面貌。一篇社论是一期报纸的旗帜；其他形式的评论文章也都代表报纸的政治见解。”旗帜就是方向。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读者，多年来已养成一个习惯：从中国党报特别是从党中央机关报的评论，去分析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中国党报评论影响之大，举世罕见。比如，1996 年 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成为一时的热点，触动两千多万股民，非股民也很关注。人们意识到：这是上头的意思。

当然，除了评论，报纸上发表的许多重要新闻，政治色彩浓，倾向性强，它们同样也是报纸的旗帜，也决定着报纸上的政治面貌。比如，1948年11月5日毛泽东撰写的著名新闻稿《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就是一面面鼓舞中国人民乘胜前进的战旗。

二、“声音论”

“声音论”认为：评论是报纸的声音，上接“庙堂之高”，下连“江湖之远”，上情下传，下情上达，上下呼应，声音嘹亮。事实确实如此。早在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半年以后，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要把群众真正的思想搞清楚，把人民心里不敢说的，不肯说的，不想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反映出来。”“人民有各种要求与情绪，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吹是不好的，应该吹的才吹，要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不是拉杂地而是精彩地反映出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上述谈话，一个着重于上情下传，一个着重于下情上达。上情下传，下情上达，都是发出声音。新闻要发出声音，评论更要发出声音。

三、“灵魂论”、“元帅论”

“灵魂论”、“元帅论”认为：评论是报纸的灵魂、元帅，在报纸上起着主导作用。我国早期报纸有过热火朝天的“以政论为本位”的时代，一些政治家在报纸上以政论为武器，宣传主张，抨击政敌。梁启超的政论被誉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以至“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政论居如此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新闻传播手段落后，消息闭塞，报纸不像今天这样有大量的新闻来源，更不像今天能这样及时地传播，只能以政论为主。新闻和政论都有时效性，但一般来说，政论落在新闻后头。随着新闻传播手段的发展，报纸已转变为“以新闻为本位”，而政论也与新闻配合或结合，发展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特点的新闻评论。

四、“眉毛论”

“眉毛论”认为：评论是报纸的眉毛，有它用处不大，无它又不像个样子，点缀而已。这本来是个古老的观点。现在，表面上看，公开宣扬“眉毛论”的不多了。其实，在报社内外，不少人仍然有这种看法。虽说“没有评论的报纸不是完全的报纸”是个公认的结论，可是，相当一部分报纸就是不登评论或尽量少登评论而照旧畅销，就连素以评论为优势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时有评论“断炊”现象，比如头版的“今日谈”专栏，有时成了“今日补”——只在新闻稿不足时，才补上一篇。这是评论的悲哀。分析原

因，往往是因为评论写得不疼不痒，无关紧要；也因为有些编辑包括主编不重视评论。除了“今日谈”这样的小评论，社论、评论员文章这些大评论也有不疼不痒、无关紧要的。这样的评论确实像“眉毛”。但是，“眉毛评论”毕竟只是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论点重要、论证精辟的评论，它们不是“眉毛”，而是必不可少的“眼睛”、“鼻子”、“喉舌”。是把评论写成可有可无的“眉毛”，还是写成必不可少的“眼睛”、“鼻子”、“喉舌”，这取决于评论员及其领导。

五、“轰动论”

“轰动论”认为：评论是报纸的炸弹，甚至是威力极大的原子弹，可以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5篇评论，气势宏伟，横扫千军，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战斗作用，可以说是震慑敌人的炸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新华社转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转载。这篇评论，也像一颗炸弹，对于摧毁“两个凡是”的堡垒起到了重大作用。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一篇反响极大、举世瞩目的社论，具有震撼性的轰动效应。

对炸弹式的评论引起的轰动效应，必须进行分析，不能

一概而论，有“正动”也有“反动”，有炸敌人的，也有炸人民的，所以，笼统地说评论是报纸的炸弹，似有偏颇。评论所要追求的，应是发挥积极的社会效益，而不是轰动，更不是震动。

此外，还有人认为评论是报纸的表情，是报纸的橱窗。报纸的喜怒哀乐，读者通过评论即可一览无余。也有人说，评论是报纸上的“盲肠”，不但是无用之物，有时还会发炎，割掉为好。

分析以上关于评论在报纸上地位的论点，可以看出，把评论看得过高或过低，过重或过轻，都不符合实际。其实写评论就是讲道理，就是说话。评论是报纸上一种发表意见的文体，是新闻武器库十八般兵器中的重要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这是其他新闻文体难以替代的。

评论与新闻关系密切，它们只有珠联璧合，报纸才能版面生辉。没有评论的报纸，不可能是一家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善于使用新闻和评论两种武器，既能采写新闻，又能撰写评论。这样，他才能在报纸上获得更大的自由，取得更大的成就，做出更大的贡献。《三国演义》中，孔明说了这样一句江南小儿民谣：“伏路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意思是说，鲁肃只能陆战不能水战，周瑜只能水战不能陆战。而孔明则是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编辑、记者，也要当孔明，既能陆战，又能水战——既能写报道，又能写评论。这也可以说是“两手抓，两手硬”。

第三节 评论的作用

一、报纸的旗帜

评论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阐明立场，表明观点，明确政治方向。通常说，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旗帜标志着方向。评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为本党、本国、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毫不客气地说话。在社会主义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都是“端谁碗，受谁管”；谁办报，为谁说。很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也难有“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纯商业性报纸”。

美国的罗伯特·史蒂文森在美国办的《交流》杂志 1995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咄咄逼人忧心忡忡革命时代的美国传媒》。文中说：如果你走访一家美国报馆，就会发现，那儿张贴着《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条鼓舞人心的语录：“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政府而无报纸呢，还是要报纸而无政府，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杰斐逊革命以后当了美国国务卿、副总统，最后还当上了总统。在同存心作对的报界争吵了几年以后，他的想法有了变化：“我们的报纸所提供的，大部分不过是一些心怀不满者的漫画像而已。的确，他们滥用了出版自由的权利，已发展到了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闻所未闻、难以容忍的地步。”很显然，这自然包括对评论的态度。美国总统在台下时是一个样，在台上时又是一个样。持这种态度的，不仅美国总统。

评论还具有祝贺、庆祝、声明等作用。每逢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每逢重要节日，每遇重大事件，往往要发表评论。另外，评论还有交代背景、提供材料、介绍情况、解答问题等作用，比如为新闻加的编者按。

从评论的特点看，从评论与新闻的关系看，它主要有以下三个作用：一是引申发挥，二是画龙点睛，三是堵塞漏洞。引申发挥是为了由此及彼，扩大宣传效果；画龙点睛是为了由表及里，剖析事物本质；堵塞漏洞是为了周密、严谨，以免给实际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二、引申发挥

评论的引申发挥，是评论依据某一具体事件，由此及彼的论证过程。引申发挥，是评论据事论理的一种常见形式。一篇评论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它是就事论事，还是就事论理。就事论事的评论，就像在地上爬行，只看得到眼前，看不到远方。这种评论，只能及事物，不能及思想；而就事论理的评论，像在天空中飞翔，俯视鸟瞰，看得广，也看得远，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由偶然的事件联系到必然的结果。请看一篇从一件小事引申发挥，提出反对主观主义深刻道理的评论：

196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摸情况后作结论》。这是一篇重要评论，当年颇有影响。

社论是从北京市灰石厂碎运车间解决矿车掉道这件小事谈起的。碎运车间的领导同志认定矿车掉道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思想麻痹，操作不良。根据这个“结论”，他们让掉道

的工人作检查，让没掉道的工人讲经验。可是，矿车仍然经常掉道，包括介绍过经验的工人也掉道。这种情况迫使车间领导同志亲自去观察操作，召集工人座谈，弄清真相，原来主要原因是道叉安的不是地方。

这的确是一件小事，如果就事论事，大可不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可是，社论从这件小事引出了一番大道理。1961年，是中国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折腾后极其困难的时期，也是1960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转变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党报社论对一些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拨乱反正。这篇《先摸情况 后作结论》，就是对那种为了给已有的结论找例证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拨乱反正，是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批评。社论在叙述了那件事情之后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于或者大体符合于客观实际的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背着“框框”去搞调查，是不能了解事物真相的。

在叙述了那件小事和亮出观点之后，社论进入正论，进一步去阐明观点，这就是评论文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的“分析问题”。这一段写得比较细，观点明确，层次清楚，照录如下：

我们所以要确定对这件事或者那件事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因为不了解它们，或者不完全了解它们。也就是说，调查研究，不是为了给已有的结论找例证，而是为了从调查的材料中，经过科学分析，作出正确的结

论，使我们的思想更接近于客观实际，从而更好地改造客观事物。客观事物，特别是比较复杂的事物，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比较明显，不需要花多大的时间就可以把握；有的则比较隐蔽，不大容易把握。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就得深入下去，进行客观的、反复的调查。要亲自到实际中去看一看究竟，听一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既要倾听多数人的意见，又要倾听少数人的意见；既要倾听干部的意见，又要倾听群众的意见；既要倾听老年人的意见，又要倾听青年人的意见；既要倾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倾听反面的意见。看和听还不够，还要想一想、议一议。想，就是将看到的和听到的材料思考一番，它们的真实性怎么样？还有没有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情况？议，就是将听到的、看到的问题，组织有关的干部和群众座谈，即做讨论式的调查，牵藤摘瓜，寻根究底，使矛盾的各个侧面充分暴露出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对所了解的事物，才能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才可以引出符合于、或者大体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结论，找到正确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只了解事物的一面，而不了解另一面，或者仅仅了解事物的现象，甚至只是了解事物的一皮一毛，就急急忙忙地下结论，动手解决问题，没有不碰钉子的。

这一段论述的是社论的基本观点。如果不再进一步，再深入一层论述，草草收尾，也可以算一篇完整的社论了。读者见过不少这样的社论，引用一段事实，说上一点道理，一

事一议，也算篇社论。但这篇社论没有到此打住，接着还有话说。这些话阐明的是一些重要观点。社论在上面一段正论之后，把话又说了回来，指出：“当然，在对某一事物进行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前，根据手头粗略的材料对它作出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设想，也是允许的。因为这种初步的看法或设想，可以给我们提供调查情况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发现问题。但是，一般说来，这些看法或设想，也往往是不全面的、不深刻的。”把话说回来，使论证更为周密。

接着的一段，也就是第五段，社论引用了列宁两段针对性很强的话。一段话是，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另一段话是，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选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社论除了引用列宁这些针对性很强的话以外，还讲出了自己针对性很强的话，比如：“如果你要坚持自己片面的意见，例证是不难找的。想要反面的材料就有反面的材料，想要正面的材料就有正面的材料。”这段话读者可以这样理解：你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大跃进”成绩巨大，例证是不难找的，一亩小麦产了万斤，土高炉炼出优质钢，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夜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同样，你要认为“大跃进”问题严重，反面材料也有的是。如果人们这样带着“框框”去“调查”，“非但不能帮助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而且加深了人们的主观主义看法，使人们的认识离开客观实际越来越远”。

社论的第六段，涉及到一个敏感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这篇社论完全可以回避之，但它正视了这个问题，指出：“调查研究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进行。这跟带着结论去作调查，是不同的，不应把两者混淆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没有为我们准备一套对一切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当成一条呆板的公式简单地套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从一件小事，谈到调查研究问题，谈到如何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问题，道理越谈越深，也越谈越透。

第七段是结尾，社论的笔锋转向了决定方针、政策、任务，或者贯彻方针、政策的时候，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一切唯心主义的做法。这就从北京市灰石厂碎运车间矿车掉道这件小事，谈到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读社论《先摸情况 后作结论》，使人感到，社论其实也是一种可以生动的文体。它为了阐明一个观点，讲清一个大道理，“由头”总是可以找到的，即使抓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可以阐明一个重要观点，讲清一个大道理。在任何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之间，都有着必然的联系，揭示这种联系，社论就发挥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作用，使一件具体的事也有普遍的意义。

写这种从一件小事谈起的社论，为数不少，有些写得精深，有些写得浮浅，原因往往在于，是就事论事，还是就事论理。《先摸情况 后作结论》依据的小事人们屡见不鲜，

就此谈出的道理却深刻尖锐。

就事论理，要把理论深、论透。社论的力量在于以理服人，以深刻透彻的道理发挥指导作用。《先摸情况 后作结论》这篇社论，与一般浅学辄止、理未透而笔已停的社论不同。它在摆出基本观点后，层层深入，一环扣一环地围绕着基本观点论证。首先，它指出调查研究不是为了给已有的结论找例证，接着，它又把话说回来，当然不是说调查研究之前不能有一定的看法或设想。后头两段，一段强调不能坚持自己片面的意见，一段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调查研究，和带着结论去调查是不同的，结尾联系到决定方针、政策、任务这些大事。

三、画龙点睛

198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评论员文章《要从严治党》，是为当天第四版发表的贪污犯蒋正国落网的通讯配发的。为了探讨评论的画龙点睛问题，对《要从严治党》略作分析。

如果不细看，这篇评论无非是一篇以贪污犯为由头写的评论。这类评论一般的写法是：叙述一点罪犯贪污的事实，分析一下犯罪的根源，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警告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如此等等。《要从严治党》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蒋正国这个贪污一百三十万元的罪犯，同其他贪污犯并无大的区别，而且也不是多么大的人物，小小武进县化肥厂的一个小小财务科长而已。

可是，《要从严治党》抓住一个小小的财务科长蒋正国，

却论述出一番关于党的建设的大道理，这就“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评论主要引申出以下内容：首先是指出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经得起执政党地位的考验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考验。（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除了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还要经受和平演变的考验，后来又叫“西化”、“分化”的考验，这就是三个考验了。）接着，评论指出，为了贯彻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我们必须从严治党，而从严治党，就必须把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尽共产党员义务的腐败分子及时清除出党，发现多少就清除多少，决不能姑息迁就。评论还强调，党纪处分不能代替国法，违犯法律的还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

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两个考验和清除腐败分子的问题，是关系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央在十三大上提出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的这些重要论点，在一篇以蒋正国这个贪污犯为由头的评论中点一点，这是点睛之笔，是向深远意义的引申。当然，这也是有点拐弯的引申，由一个一般的贪污犯引申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有点牵强，不太自然。所以，这篇《要从严治党》并不能作为研究评论引申的典型，但由它可以引发评论画龙点睛的话头。

四、堵塞漏洞

1991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情系国防 固我长城——苏南人民支持军队建设纪事》，文中提到：“近年来苏南农村许多地方实行‘三个通知’一